

文化时讯

柳斌杰：力争三年建起新闻出版新体制基本框架

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(周婷玉 李世钺)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23日在2008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工作会议上说：“力争三年建立起新体制的基本框架，完成重塑市场主体和培育战略投资者、实现科学发展的任务。”

他指出，深化文化改革，既有明确的路线图，也有具体的时间表，新闻出版领域体制的改革要按路线图、时间表，把任务落到实处。

柳斌杰说，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深化改革要企事分开，该放开的要放开，该管住的要管住，建立新的运行机制。三年内要完成158家中央在京出版社、103家高校出版社以及所有地方的出版集团、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和股份制改革任务。

经营性报刊的改革分为三步：国有企事业单位主办的报刊在第一阶段完成改革，第二阶段是改革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主办的报刊，第三阶段是部委所办的报刊。

他还指出，印刷、复制、发行企业要打破地域和行业限制，形成以国有主导、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。

“新闻出版领域改革任务占到文化体制改革任务的2/3，必须切实加以推进，不断取得新的突破。”柳斌杰说，“实践证明，改革是推动新闻出版业发展的巨大动力，哪里有改革，哪里就有大发展。”

柳斌杰介绍，最近对全国24家出版集团的调查结果，17家完成转企改制的出版集团公司，平均总资产增长66.2%，利润总额增长25.3%，最多的翻了三番；而7家未改制的出版集团，平均负增长43%。全国有40多家报业集团完成了事企分开，发行业的股份制改革和跨地区经营形成了新的格局。9家改制到位的出版、报业、发行集团公司在境内外上市，初步确立了战略投资者的地位。

世界首个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在京成立

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(记者唐召明)世界上第一个汉藏佛学研究中心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。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、全国政协、中国佛教协会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，以及宗教人士40多人出席了成立大会。

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大会上介绍说，汉藏佛学研究中心的成立，是人民大学紧跟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步伐，跳出旧国学的樊篱，建立创新型的大国学理念，并在此理念下积极探索、勇于实践的结果。

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沈卫荣在主题发言中，列举史料说明汉、藏佛教之间在历史上的紧密关系，认为汉藏佛学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汉藏两个民族相互了解，促进在宗教文化上的相互理解、培养和建立两个民族之间在文化和情感方面的亲和力。

成立大会上，世界著名佛学家谈锡永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共同为汉藏佛学研究中心揭幕。

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：网络文学渐入主流

本报讯 网络文学已日益成为当代文坛重要的创作力量之一。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6月21日在“2008起点作家峰会”上表示，历经多年的对立与融合，网络文学近年来已得到主流文坛的关注。

据中新网报道，早在十多年前，张抗抗就曾担任某个网络文学大赛的评委。此后，她持续关注网络文学。2000年，张抗抗甚至还在美国作演讲，介绍中国的网络文学。“网络文学非常特别，它表现得格外、丰富而且另类。网络作家的笔名和作品的调控看起来很奇怪，这激起了传统作家的好奇心。”

张抗抗认为，在信息时代，网络文学进入文学的范畴，进入阅读的范畴，是必然的发展趋势，因为它的生产方式和阅读方式都非常快捷。“如果说一开始，以传统方式写作的人与网络文学有所对立，那么今天，网络文学和纸质文学有了更多的融合与互动：一方面，网络作家群体越来越壮大，网络文学逐渐被纸质作家所接受；另一方面，传统作家的作品也不断被网络所转载和选登。”

据悉，张抗抗劝告年轻的网络作家，要保持创造力和写作冲动，避免去模仿或重复他人。“文学是一种创造，不能被多少年重复的目标诱惑以后就改变初衷。” (钟新)

我国原创动漫作品首获新闻出版总署资助

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(李世钺 周婷玉)新闻出版总署日前公布了2007年原创动漫扶持项目评审结果，共有42个项目入选。这是新闻出版总署首次对优秀原创动漫出版项目进行经济资助。

据了解，这42个项目是从全国各级新闻出版部门组织申报的200多个项目中筛选出来的。其中图书类占一半以上，共23个，期刊类2个，电子出版类2个，音像制品类6个，网络游戏类9个。

目前，我国有超过3.5亿的青少年动漫读者和观众，是全球最大的动漫目标消费市场，发展潜力巨大。但原创能力差成为制约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最大缺陷，多数国内动漫企业停留在代加工的产业链低端，缺乏领军人物和创新人才，市场上仍然以日、美、韩等国的动漫产品为主。

荒诞描写直指知识分子的阴暗 新小说《风雅颂》引起文坛争议

阎连科：用荒谬撬开精神的真实



阎连科

著名作家，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，1979年开始写作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日光流年》、《受活》、《丁庄梦》等8部；中、短篇小说集《年月日》、《朝着东南走》等10余部；散文、言论集5部；另有《阎连科文集》12卷。曾先后获第一、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，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。其作品被译为日、韩、法、英等10余种语言，在2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。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。

来自内心的精神自传

因《受活》、《丁庄梦》等备受争议的作家阎连科出版了新作《风雅颂》。看了《风雅颂》的人说：“阎连科，你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。”而小说片段在杂志发表后，立刻有名校长师写好批评文章毫不留情地还击。此时阎连科带给编辑部的朋友，希望能在书出版后再发表批评文章，因为这部书稿辗转了多家出版社，让小说面世，困难重重。

用荒谬撬开精神的真实

不过，阎连科也认为，比想象的荒诞更严重的是现实的荒谬。小时候，他常常看见镇子里有女人“鬼附体”后满地打滚，他三婶便拿个盛菜的盘子，里面放三根红筷子，不停地呼喊最近周遭死去的人名，当三根红筷子竖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喊对了人名，被鬼附体的人，这时如果说：“我好冷呀，”你就得给他烧些衣服；如果说“我的房子破了”，那死去的人的坟墓就肯定被雨水冲了个洞，补过之后，那女人就又复归平静。阎连科说，当三根红筷子竖起来的时候，就意味着“假的”其实就是真的，这其中隐藏着写作的奥秘。童年的经历，或许影响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，他说“逆真实而行，用荒谬撬开精神的真实，也是小说的一种”。

写作是精神真实与荒谬现实的结合

有人说，阎连科近年的小说，争论不断，批评声此起彼伏，是中国“最受争议的作家”。这时候来写《风雅颂》，题材从乡村忽然转向知识分子，其实是一种“挑起事端，无中生非”；他不断变换的

他灵魂的一次自我剖析。所以，连主人公的名字都叫“杨科”。

清燕大学的名目，让人不由自主就产生了联想，也正因为如此，《风雅颂》引起了种种非议。写作三十余年，阎连科的小说很少被人对号入座，这是第二次。第一次是1987年，他以宋代理学家程颢、程颐的家乡为故事背景，写了他的成名作《两程故里》，结果人家全村二百号人，要来找他所在的镇子滋事打架。阎连科说：“这事20年前发生在农村，不识字的农民对说祖宗坏话的人不依不饶，我还能理解。但是，时隔20年，如果高校教授认为这本小说挖了教育的祖坟，这件事的荒谬，就超出了这本小说本身的荒谬。”

《风雅颂》关键词解读

【懦弱】

小说中，当主人公杨科看见妻子和副校长正躺在自家的床上，他鬼使神差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晴天霹雳地在他们面前跪下去，像倒下的一棵椰树要征服一座山，跪下重复说：“我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，请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？”他的怯懦，以一种扭曲的夸张，变形成了读者面前。阎连科说，杨科“下跪”的举动，不是他的虚构。在河南，就有过一位副教授在第三年评教授时，推开评委的门，当场下跪，因为他说这次竞争中，还有校长的老婆，她才不得不出此下策。

【无力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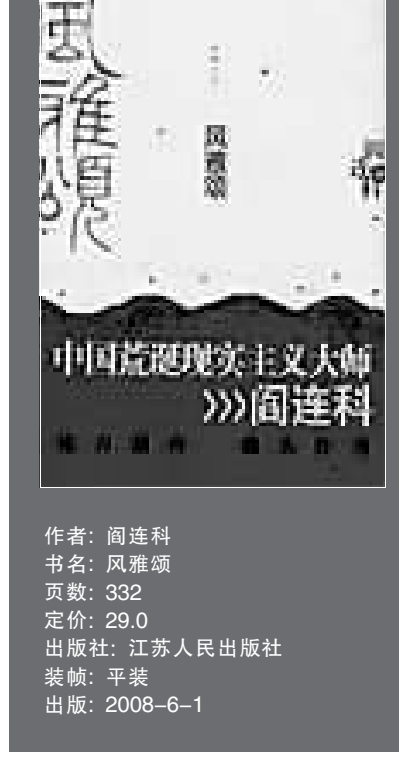
这部小说对于阎连科来说是有相当难度的，他改变自己小说写作中的乡土视角，调整了方向，转身透视知识分子的困境。这部小说原名是《回家》，我看过后，觉得这个名字会把小说的意义限定在“乡土”意识上，由新形式回到旧哲学。所以建议他改名，后来他改成了《风雅颂》，这还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名字，但与内容贴近。

【伪善】

在《风雅颂》中，类似名师们一边抚摸着性服务工作者，从这些少女身上汲取着她们的青春，又一边道貌岸然地规劝她们回家种地。这样的讽刺在小说中比比皆是。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，阎连科写到一个在猪圈旁的泡桐树，又粗又壮，可就是长不直，从半腰朝着猪圈对面歪，树枝叶叶都朝着猪圈，全村人都夸这树德行好，准备为20岁就守寡的奶奶做棺材，结果挖坑伐树时候才发现，树根全扎在猪圈那一边，“读书人就和这棵树一样，把根偷偷扎到猪圈，把身子、枝叶露得离猪圈十万八千里。” (据《新京报》)

写作形式，挤压着故事内容，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阅读障碍，这其实是某些批评家在写作。

对于种种批评，阎连科坦然地说：“在这部小说里，我用扭曲的方式，讲述了一个扭曲的故事。我在形式、内容、语言、对话、细节上，都做了最大的探索，这正是我要坚持的写作方向——精神真实与荒谬现实的胶着。写完《风雅颂》，我已进入五十岁的门槛，我不再逼问自己为什么写作，也不再管别人说些什么。我渐渐明白，写作也许就是一种对人生的偷窃，像一个法官威严地去审逼着一个不能控



制自己去偷窃的孩子。也许那个法官得到了他理想的回答；也许，那个孩子被逼问致死，都回答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去偷窃别人的东西？”这就是阎连科今天写作和之所以这样写作的理由。

《风雅颂》关键词解读

【懦弱】

小说中，当主人公杨科看见妻子和副校长正躺在自家的床上，他鬼使神差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晴天霹雳地在他们面前跪下去，像倒下的一棵椰树要征服一座山，跪下重复说：“我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，请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？”他的怯懦，以一种扭曲的夸张，变形成了读者面前。阎连科说，杨科“下跪”的举动，不是他的虚构。在河南，就有过一位副教授在第三年评教授时，推开评委的门，当场下跪，因为他说这次竞争中，还有校长的老婆，她才不得不出此下策。

【无力】

这部小说对于阎连科来说是有相当难度的，他改变自己小说写作中的乡土视角，调整了方向，转身透视知识分子的困境。这部小说原名是《回家》，我看过后，觉得这个名字会把小说的意义限定在“乡土”意识上，由新形式回到旧哲学。所以建议他改名，后来他改成了《风雅颂》，这还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名字，但与内容贴近。

【伪善】

在《风雅颂》中，类似名师们一边抚摸着性服务工作者，从这些少女身上汲取着她们的青春，又一边道貌岸然地规劝她们回家种地。这样的讽刺在小说中比比皆是。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，阎连科写到一个在猪圈旁的泡桐树，又粗又壮，可就是长不直，从半腰朝着猪圈对面歪，树枝叶叶都朝着猪圈，全村人都夸这树德行好，准备为20岁就守寡的奶奶做棺材，结果挖坑伐树时候才发现，树根全扎在猪圈那一边，“读书人就和这棵树一样，把根偷偷扎到猪圈，把身子、枝叶露得离猪圈十万八千里。” (据《新京报》)

学界评论

对现实的碰撞需要缓冲

王尧 (评论家 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)

这部小说对于阎连科来说是有相当难度的，他改变自己小说写作中的乡土视角，调整了方向，转身透视知识分子的困境。这部小说原名是《回家》，我看过后，觉得这个名字会把小说的意义限定在“乡土”意识上，由新形式回到旧哲学。所以建议他改名，后来他改成了《风雅颂》，这还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名字，但与内容贴近。

我想强调的是阎连科对中国文化、大学、乡村、知识分子和农民有自己的理解。他始终处于焦虑之中。这部小说并不是对某个大学的具体批判，而是对我们整个社会思想精神状态的不满和质疑。阎连科当然不可能指出一条道路，小说中杨科逃回到乡村老家，最终又从诗经古城遗址出走。这些年，我也想提醒阎连科，写作速度放慢一点，对现实的碰撞需要缓冲。过度的焦虑和紧张，会使写作失去从容。无论是作家本人，还是他的作品，不能总是处于张力之中。

读了心里不舒服

谢琼(北大中文系博士)

这本小说发表后，因为书中对清燕大学的描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。作家定义它为第一高校，清燕大学里的湖，还有体制等等，都让人轻易地就想到北大，当然荒谬的种种故事又和事实不符，感觉作家好像是借用了这个背景来说自己的事，读了心里不是很舒服。

在我看来，作家在这部小说里将本土现实与异域主题的对接是有缝隙的。主人公杨科在书中把《诗经》比作中国的《圣经》，把“诗经”描写成伊甸园，但因为人自身的堕落，很难找到精神的归宿，对于这个结尾，作家显然是偷懒了。在小说里，作家理念先行，把他对世界的看法引用了中国的现实并且扭曲了现实来作以解释。而我认为，所有观点应从现实生发而不是理念先行。

作家是否有能力忠于现实又总结出一个一以贯之的理念，写出一个前后呼应叙述完美的故事，随着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不断深入，我们发现这是一个越来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(据《新京报》)

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——略论丘濬的民本思想

方宝璋

丘濬(1421—1495年)是明代中叶著名的政治人物和先进思想家，其著作《大学衍义补》(以下简称《补》)只标卷数)卷帙浩繁，内容丰富，涉及范围广泛，其中闪烁着民本思想的光辉。丘濬认为治国平天下之事虽千头万绪，但最根本的是以民为本，民是君立、国存的基础：“盖君之所以为君者，以其有民也，君而无民，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？”“国之所以为国者，民而已，无民则无以为国矣。”(卷13)因此，他一再劝谏最高统治者：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之言，万世人君当守于座右，以铭心刻骨者也。”(同上)

基于这种认识，丘濬提出“爱民”的主张：“人君知天之道为生民立我以为君，则必爱民之民。”(卷5)究竟如何才能达到爱民，他认为首先必须教育养民，让老百姓衣食无忧：“爱民之道，不过顺其好恶之心而已。大约民所好者，饱暖安乐，所恶者，饥寒劳苦，使民常得其所好，而不以所恶之事加之。”(卷81)古代中国是农业大国，农业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，故“人君之治，莫先于养民，而民之所以得其养者，在稼穡树艺而已。”(卷14)。丘濬针对明中期土地兼并严重的现实，提出实行“配丁田法”，限制土地兼并。这在当时虽然不能根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，但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。在重视农业的同时，丘濬还一反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，反对国家实行盐茶专卖和重课商人，主张通过发展私营工商业、海运漕粮、海外贸易等使民致富，从而达到藏富于民：“民之富，即君之富也”(卷22)，“古者藏富于民，民财既理，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。”(卷20)因此，他反对横征暴敛，认为国家征收赋税是必要的，但只能“薄取”、“轻敛”。“治国者不能不取于民，亦不可过取于民。不取乎民则难乎其为国，过取乎民则难乎其为民。”(卷22)

丘濬发展了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，



本报记者 李幸璋 摄 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资料库提供)

强调民心即天意的体现：“民心之所同，即天意之所在也。”(卷3)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民心：“君无民则无以为国，而君又安能以一人之身而自为哉？此人君所以贵乎得民也。所谓得民者，非谓得其土地生齿也，得其心也。”(卷13)他对三代时重视民意、善听民意十分向往，希望国君要“广陈言之路”，“皆许人陈言得失，则人君时得时以闻过失与其知见之所不及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则天下国家其有不治也哉？”(卷4)丘濬认为选拔人才是国君治理国家的重要之重，而与民众最为亲近的地方郡守、县令的选任更关系到国计和民生：“自古圣帝明王，知天为民生己以为君，莫不以重民为先务。重乎民，必重治民之官，而于其所亲近者尤重焉，守令是已。”(卷18)因此，他建议朝廷派遣德才兼备之人担任地方官，避免“一处不得其人，则一处之民受其害”的状况(卷19)。

丘濬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他十分关注民众疾苦。丘濬出身贫寒，对下层民众的艰辛有切身的体验。他认为“固邦本”之政，除谋求一般百姓的福祉外，对于鳏寡孤独、贫苦无告者，以及不幸遭受灾害的百姓，尤其需要予以救助。他建议由朝廷制产立法、编制预算、设立机构收容安置“无所依傍者”；主张酌仿古制，通过“散利”(发放公家积蓄)、“薄征”(减民租)、“弛役”(休息民力)、“舍禁”(山川森林解禁让民众取之)等措施来救助灾民；他还强调要铲除天灾人祸的根源，如整治黄河以防洪水泛滥，通过就地安置解决流民问题，废除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等，使民众安居乐业。

在丘濬的治国蓝图中，教育的作用得到了充分重视。他说：“人君承上天之付托，为万民之父母，必当尽治、教、养之三事。养之以至于繁庶，治之以至于富足，教之以至于仁厚，则尽父母斯民之责，而无负乎上天付托之重矣。”(卷67)由此可见，他认为人君治理国家，单使民众繁庶富足是不够的，还要让他们善良淳厚，这就要通过立校设教，让民众接受教育，为良从善。丘濬提出全民教育、全方位教育的思想，必须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的润化，做到“无一人而不化，无一地而不到，无一日而或间”(卷67)。

丘濬有关国家立法、刑罚方面的论述中也充分体现了其民本思想。他认为国家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“顺承天道以安民生”(卷107)，坚持传统儒家“德主刑辅”的治国方略，主张以德治民。在明代君主专制独行、推行严刑峻法的时代背景下，丘濬提出立法要宽严适中，以合乎“民情”，只有在不得已时才用刑罚：“所以为治者，德也。刑非所先也，民有不齐者，不得已而用刑以治之，姑以一日齐民之用也。”(卷101)

循着民本思想反对残杀的思路，丘濬对战争提出了独到的辩证见解：“敌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，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”(同上)。他指出国家养兵的目的是为了卫国安民，战争的宗旨是为了奉天安民，赞赏古代兵书中“杀人安人，杀之可也”和“以战止战，虽战可也”的观点，提出“攻其国爱其民，攻之可也”(卷116)。丘濬认为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：“所谓兵要在附民，民不

丘濬简介

丘濬(1421—1495)，明朝阁臣，思想家，经济学家。字仲深，号深庵，福建泉州府同安人，后人又称丘文庄。琼山(今海南省琼山市)下田村人。丘濬一生勤奋好学，博览群书，研究领域涉政治、经济、文学、医学等，著述甚丰，其代表作《大学衍义补》、《世史纲》、《本原格式》等。

亲附，则汤武不能以必胜。”(卷116)他告诫最高统治者发动战争必须仁义之师，正义之师，才能无往不胜。

在汉文中央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上，丘濬主张各族和睦相处，既反对少数民族贵族发动的掠夺战争，也反对汉族中央政权穷兵黩武，攻打欺压少数民族。“天德好生而立君以养民，夷狄人吾族，贼吾民，不得已驱而出之，使吾民不罹其害，可也。彼不犯吾边，乃无故兴兵出塞，求而击之，其曲直有在矣？”(卷156)他认为要使边疆安定，上策是人君必须对汉族与少数民族一视同仁，善待他们，使他们各自安于自己的生存空间。“夫圣人天体地以为心，兼爱华夏之民，使之各止其所，而不相侵害，天之道也。”(同上)这在当时是相当难能可贵的。

综上所述，作为明代中叶的朝廷重臣，丘濬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，把传统儒家民本思想加以演绎深化，从经济、政治、文化教育、法律和军事边防诸方面进行系统化、具体化和实践化，富有创造性地提出爱民、富民、养民、教民、便民、安民、顺乎民心、使民亲附、兼爱华夏之民等思想，并在治国平天下中努力将其付诸实施，给后世留下不少历史启迪。

(转载自6月22日《光明日报》 作者单位：江西财经大学)